

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

关键时刻

透视合艾和平协议



柯林·亚伯拉罕

林嘉运 译

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

关键时刻

透视合艾和平协议

柯林·亚伯拉罕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作者：柯林·亚伯拉罕
译者：林嘉运
版权©柯林·亚伯拉罕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际书号：978-967-5832-33-8

出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sird@streamyx.com
网址：www.gerakbudaya.com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排版与封面设计：Janice Cheong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Abraham, Collin

[Gai bian Malaixiya zheng zhi fa zhan de guan jian shi ke: tou shi
He'ai he ping xie yi]

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透视合艾和平协议 /
柯林·亚伯拉罕

ISBN 978-967-5832-33-8

1. Malaysia--Race relations.
 2. Malaysia--Ethnic relations--History.
 3. Malaysia--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 Title.
- 305.8009595



感言

由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始于“不严肃的描述”，所以我在这里必须优先慎重地感激所有帮助我将假设置于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的人。我最初对于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的“知识”属于一个普通“门外汉”的程度。那时候，我的认识是“那些试图取代殖民政府的华裔共产恐怖份子被打败了，而紧急状态在国家独立（Merdeka）下结束”。

因此，我想在这里感激那些协助我形成这个研究计划书的一些重要评论。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研究者，在给我的一则私人便条当中，这样说到：“那些具有反殖民左派分子的政治阵线（亦促成早期的国家意识），也是那些过去为政治独立斗争的人们，较后成为了对抗左派运动战争中的受害者”。在这一点上，我也深深地受惠于此消息来源，因为其让我得以参考唐娜阿莫鲁索（Donna Amoroso）的著作《1945-47年的危险政治活动及马来民族主义运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心里感到警觉，即让我警觉到我不能过分强调“英国人给予巫统的独立”这个先人思想的重要性。

随着这个“被揭露的真相”和在我将研究计划书的初稿呈交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后，我也获得非常有益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让我得以透视我整体的研究。我因而想藉此机会表达这些意见：

你那个认为“和平并不是平白无故地来到马来西亚”的概念非常重要，还有你对许多偶然事件的一个深层分析叙述是这个时代的文献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补充资料。

你有关国家和谐及反殖的论点中和了一般的论点，即“很多人认为马共为外来武力及具有汉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

另外，我试图从一个“社会革命”的背景中摘要出马来亚社会的演变过程。这是为了平衡我们一般对马来亚独立道路的认识及“在合艾协议中那个姗姗来迟的成果。”艾德蒙哥梅滋在他那篇序言中提到这些成果能够很好地成为未来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指标。

这些视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开端，并让我能够间接及非间接地会见那些参与这场反殖抗争的人们。我优先进行一个关系网络的网站计划，而我非常感激一些朋友给予我的全部协助。例如比莱（M.G.G. Pilai）在他健康不佳的时候仍然陪伴我搭乘巴士（这是我作为一个领养老金的退休人士唯一能够负担的交通工具）去会见马来亚民主联盟及槟城其他反殖运动的领导人。在我一连串的探访中，有一次，我有幸获得林建财建议去阅读一本出色的著作，即哈伯的《帝国的终结及马来亚的形成》（T.N.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这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列就是要确认：为何土著马来人普遍上对英国殖民地统治的对抗会如此不广泛或没有预料中的效果？这是整个马来亚殖民地经验历史中的现实面，而其涉及的事件可能不同。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有机会从马来西亚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个人面谈中获益。马哈迪医生建议我更详细地去考察 1915 年发生的吉兰丹起义事件。他认为这是马来人唯一一起反抗英殖民政府的事件，而我很感激他向我指出这点。

我们非常需要承认印裔群体在反殖斗争中的贡献，特别是因为这部份还没有获得其应得的关注。在某个程度上，对于这个

社群的剥削及痛苦已经被记录。这些记录几乎都在描述他们面对殖民不公平及伤害时的默从。（陈平在他的著作中说他第一次察觉到殖民主义是他看到印裔苦力在经济大萧条时面对的困境。）但，在这本著作里我已经指出了种植业劳工不仅是一群默从于殖民主义的人，而事实上他们站在抗争前线并是导致紧急状态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工会的示威行动停止了橡胶的生产及出口，而橡胶带来的利润是英镑区及美元区生存的基础。

然而，这些苦力的困境同等于他们被视为殖民国家的敌人。我深深地受惠于迪瓦斯提卡莫尼先生（Garmany S. Thivasigamony）转交我一份《吉打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报告》（1947年8月1日）的影印本。我强力地鼓励读者们不仅要阅读这份资料，还要研究这份数据内记录那些施加在这群人身上的残暴行为，尤其那些无辜的女性及孩子们。这份证据也支持一个论点，即那个种植社群是以一个一个残酷的手段被对待。我相信在这里值得我再重复这个调查报告以便读者们能够了解那个状况的重点及本报告的重要意义。（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有马来民族党、泛马总工会、泛马橡胶工会联合会、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我个人还非常感谢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员亲切地安排我影印所有相关的数据并带回吉隆坡。就如这本书的成果证明了，他们的协助肯定是其中一个让我能够完成这个研究并在十五个月内呈交全稿的因素。

我相信这个研究本身的主题及性质是其中一个原因使到读者们难以仿效我及协助我所进行的研究。这并没有吓到我的表妹达儿西（Dulcie）使她同意并出色地帮我修改及校订这本书最困难的章节，而我感到可惜是由于她由一个预先安排的海外工作，所以没法完成这项任务。然而，我有幸邀请到埃德蒙哥梅滋（Edmund Terence Gomez）为我写了一篇序言并同意（尽管他当时在联合国机构的工作非常繁忙）为这本书的一些章节给予大量修改的建议。

序言（一）

马哈迪莫哈末（Mahathir Mohamad）

这是一本勇敢及“非凡”的书。“马来西亚—马来亚共产党的和平协议”是以马来西亚的“关键时刻”的观念来阐述，因为其最终为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一些人可能对这点提出质疑，但我肯定没有国家能够像马来西亚那样成功地应付游击队的叛乱。虽然，这个行动耗费了许多时间，但马共最终同意放下武器。这时候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我们并没有庆祝。马来西亚的人们似乎将之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件。

马共宣称他们为马来西亚的独立而战斗。这主张在英国人仍然统治这个国家时还有点合理。但，在 1957 年独立后他们这个主张就失去了意义。马共仍然以它过去对英殖马来西亚的残暴方式跟独立的马来西亚战斗。

然而，这本书最特别且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是它所采用的视野。它在政治经济的框架中争议和平协议这件事是殖民地统治对马来亚的原生及移民社会的影响，并提到后者对前者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的斗争。因此，这本书可以被视为马来亚殖民及后殖民地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图。这本书的内容围绕在三个种族群体各别对抗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斗争及牺牲经验。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本书可以说开始于其结束之处。

这本书也提供一些“漂亮”的言论。其研究了马来人作为这个国家的土著如何对英国统治展开第一次抗争运动这件事的重要历史意义。这个研究毫不含糊地认可了马来亚属于马来人，而后者组织了第一次的抗争运动来反抗那个伴随着对政治剥夺、经济边缘化及让马来人疏离现代化进程的主权篡夺。但，这个抗争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遭到英国人的残暴压制，后来马来统治阶级本身也跟殖民地政府合作并参与到这些压制行动。尽管最初的抗争被打败，但抗争仍然持续进行，并使到英国人在马来亚的整个统治时期都难享有连续六个月的“和平”。

在这个背景下，很少有人明白到马来人深深地憎恶外国势力的统治。在这里指的是英国人。一些马来人趁机加入日军，因为后者答应给予他们脱离英国人的自由。第一个马来政党即马来亚马来民族党的成立（PKMM）表露了他们拒绝殖民地统治的决心。这政党寻求“至 1511 年马六甲陷落后，从白人支配中重获我们的家乡。”（幕斯达法胡先回忆录：巫统之前的马来民族主义 {刊登于当今大马网站，2006 年 5 月 13 日}）。这里的重点是马来民族党加入日军而成功获得武器。民间传说也强调握有武器的重要性。一句马来俗语如此忠告：“没有枪枝的话就应该让步”（同上，刊登于当今大马网站，2006 年 2 月 26 日）。

上述的讨论关系到紧急状态其中一个最具争议的层面，即为何一些马来人加入马来亚共产党？这一点已经充分地被记录，即经济困苦造成遍布的绝望，尤其在那些（马共）新成员所居住的区域。同时，证据也显示那些加入以华裔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的马来人在森林及营区中遭受一些歧视。尽管如此，那些马来人认为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以获得武器是他们对抗英国人并获得独立的一个很好机会。

这本书已经强调了一些马来民族主义者、马来左派份子及伊斯兰政党都一致参与反殖抗争运动，所以尽管带有负面的影响，但非马来人应该为一个独立自由的马来亚寻找自己的位置。

布哈努丁主张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既建议了马来人及非马来人为“马来由”的共同民族。

这本书绝不是“紧急状态”的“最后一句话”，而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足够的兴趣并引导更进一步的研究。

我也相信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应该对马共及紧急状态进行更多的研究。这是因为至今为止的相关书籍都由英国人所撰写。他们的书写很自然地带有偏见。

马共在我担任马来西亚首相时放下武器。我让读者们自己来评估这件事的意义。但，这件事肯定象征了一场涉及了游击战并拖延很久的叛乱之结束。游击队员相信他们能永远不被打败。但在马来西亚，他们战败了。



序言（二）

再益依布拉欣（Zaid Ibrahim）

柯林亚伯拉罕在 1960 年代晚期游透了这片土地。那时候，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公务员，并热诚地从事及执行社会福利及发展计划。在敦阿都拉萨晚期的指令中，他是负责国家前进计划（Gerakan Maju）的国家委员会内的十一名成员之一，并负责监督小区发展计划的执行过程。（值得提起的是他是唯一的非马来人且是最资浅的公务员，其他的成员都主要握有其他政府部门的执行秘书职位。）他从事的工作让他染上一个强烈的“社区”意识，并也许是学术界中最理解人们琐事及期待的人。他长期在大学里担任社会学副教授（18 年）及一名学术的活跃份子为他带来了成功。他撰写了许多的文章并出版了两本书：《为国家团结而大声说出》及《赤裸的社会秩序》。在退休后的今天，他撰写了这本书并再次展现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忱。这本书是有关那些激起马来亚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相关事件的研究。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是那个英国帝国主义及殖民地剥削如何确立了一个具有差别待遇的政治结构，以便透过间接的方法来维持他们对马来亚的政治及经济体系的控制。这导致了在地多元民族的社会缺乏团结，并让英国人得以透过压制其他替代政治解决方法来维持他们的政治霸权。

作者也提供我们一个独立前的长时间历史叙述。我们这段悲痛的去希望能帮助我们完全感觉并理解殖民主义及剥削历史的影响及意义。他的叙述里也包含了我们历史中同等重要的碎片；有关如何透过扭曲及虚构普通劳工人口来维持其政治霸权；以及分而治之的政策如何促进及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及不平等；并如何去服侍“主人”的那一端。更重要的是作者带些勇气去解释了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左派运动在独立斗争中的角色及合作（我说带些勇气是因为马共犯的暴行没有并难以轻易地被人忘记）。（联盟三头政治之外的）马来人及华裔共同对抗英国人这些事很少被讨论或甚至被知道。但，我们仍然要了解这重要的过去，不管过去是多么地悲痛。作者对这么一个非常棘手的题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这肯定能够吸引广泛的注意，尤其有关他的一些主张及观点。

马共跟马来西亚政府在 1989 年签署了和平条约。这本书记录了有关这个协议的点滴，而为何作者倾向于将这个协议视为马来西亚的关键时刻也许是令人感到好奇之处。这一点必须从这本书展现的理论视野去理解。然而，有关马共的诞生、华裔劳工及农民响应马共呼吁的原因，还有英国人如何非常聪明地让马来人与华裔陷入对抗状态等都是一些非常具有启发的题材并须要更多的研究。我们无可否认在第二次大战前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马来反殖运动；还有，霹雳起义事件及督江古在吉兰丹领导对土地税的起义迅速及残忍地被镇压。这些事件都说明了马来人因缺乏武器而感到无助。因此，他们跟马共合作。后者拥有武器这件事对一些马来民族主义者来说非常之重要。

我们独立斗争的种子远在 1946 以前就已经被播下，而巫统的斗争只是其中一个支派。现代马来民族运动源自 1930 年代中国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影响。最初且最重要的运动是由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青年联盟所发动。随着民族主义浪

潮的激烈化，其他运动组织也开始成形，例如觉醒青年团（后来的卫国青年团）、觉醒妇女团等等。这些运动组织都被卷标为“左派份子”。这标签主要是因为他们创立初期受到印度尼西亚对抗荷兰殖民的独立战争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所致。一些领袖如布哈努丁、乌斯塔兹巴凯尔（Ustaz Baker Bakir）在马来人群中都具有很大影响力及追随者。在霹雳新芒魏（Gunung Semangol）聚集了超过五千位马来人这个事件里就很清楚地证明了马来左派及伊斯兰组织支持对英国人进行武装斗争这个想法。这促使了拿督翁查化宣布这些团体为“来自山里的危险”，并将他们视为对巫统的威胁。

在日据时期，马来青年联盟对一个独立马来亚的渴望，使他们支持日本对英国人的战斗。英国人为了打败日本因而跟马共合作。当日本撤退后，马共面对跟马来青年联盟相同的命运。他们双双被英国认列为非法组织。这使到他们只好为了他们“将马来亚从殖民主义者的枷锁中解放”而提起武器。结果，他们很多的领袖都遭到逮捕及扣留，例如阿都拉西迪、拉昔迈丁及布斯达曼。这些运动组织脱离巫统有几个原因，而最重要是因为很多巫统成员都来自马来精英阶级并跟英殖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本书也详细记录了华裔与马来人的合作关系，并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及新的视野。巫统领导的联盟的确废止了马来亚联合邦并最终获得独立，而这本书也显示了英国人不准备参与一个长期的游击战争。这特别是因为马共得到那些反英“马来左派”支持。在那个寻求直接独立并准备跟英国人战斗的马来左派运动组织及那个愿意为独立而谈判的巫统之间，英国人选择了后者。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说可能是武装斗争促使英国人给于马来亚独立。这并不是在暗示英国人要无限期地将马来亚保留为一个殖民地。其实，最早在 1941 年丘吉尔跟纳粹在欧洲战斗的时候，英国已经决定放弃苏伊士运河东部殖民地。事实上，丘吉尔派遣邓普勒到马来亚的特别命令是要邓普勒找寻解脱这个殖民地

的最好方法。然而，英国人在战后面对了紧逼的财政压力，而这使到他们需要保留马来西亚这么一个丰富的殖民地来支持他们母国的重建。这本书展现了一个视野，即其显示了其他马来及非马来民族主义运动及英雄们协同了巫统的独立斗争。

他们说历史都在描述着胜利者，而不是那些被击败的人。因此，在这观点下就从来没有一个具有科学验证的知识。但，我们还是需要去希望真相能够及时展现，而历史学家不断深入挖掘这些纪录能显现给我们更多的过去及让我们重新理解历史过去。当然，没有历史学家企图记下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就像没有历史学家可以知道发生过的每一件事。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及研究人员去撰写、探讨及分析我们的历史。每个世代都要求以自己的基模去重铸真实，但这不是因为真实不断改变或形式不同。这是因为概念及观念改变，并影响了我们看待及理解事物的模式及方法。就如歌德（Goethe）所言：“…历史必须不时进行重写，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真实，而是因为视野有了新的观点。”

我对历史及这本书的兴趣源自于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历史；让我们能够学习且不犯上相同的错误。我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困于过去殖民地时期持续至今的错误观念，我们将没法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及达到一个文明及现代国家所需的标准及成就。我们很快就要庆祝独立五十周年，但我们仍然被族群及阶级所区分。就像过去英国人对我们的控制那样，而政治及主要政治领域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面对（国家）内部的问题或为寻求迅速的群众声援时，政治家普遍打出种族牌或宗教团体来捞取支持。我们仍然认为族群及宗教能够将我们从“他人”的手中拯救我们自己；但这个“他人”都跟我们相同都是马来西亚人。

我鼓励所有喜爱这个国家及想看到我们未来世代前进的马来西亚人去辨识出我们真正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些仍然“殖民”我们思想及行动的人。当然，敌人不再是英国人，但他

们仍然采用相同的老旧策略。将人们分而治之、将人们区分并分类、将恐惧灌输给人们，并用妥协及保守思想去教导人们。这些人可能是马来人、华裔或来自其他族群的人。不管那些“殖民者”是谁，如果我们继续允许他们渗透这样的思想，那么他们将会继续掌握政治及行使经济霸权，而（马来西亚）人民将无法团结并因而面对困苦。当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民族、如同一种人般说着话并不分种族、信念及阶级去关心其它同为马来西亚人的人的时候；那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巅峰时刻。然而，这趟旅程离目的地仍然非常遥远。



序言（三）

黄永安（James Wong Wing On）

柯林亚伯拉罕能以一个具有深度经验历史知识支持的现代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叙述及论述英国对马来亚的长期殖民过程，对他的努力我们表示赞赏和道贺。容许我分享几项个人观察来点缀这个这个理性论述。

马来亚现代史成功组织了一个具有庞大真实及数据并能够供作为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些数据涉及了种族、宗教、语言、文化、社会阶级及意识形态各层面。

我相信特别是对那些参加现代马来亚建立过程的各种社会力量、团体、意识形态及个人有关的阶级及意识形态分析的修复，能够使我们更深入理解马来亚。

例如，马来亚华裔社群从来都没拥有过单一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就如柯林亚伯拉罕那个具有深度见解观察所叙述般，国家主义（国民党）及左派份子（华裔社群）最初且最重要的深刻区分。前者的支持者普遍上是华裔社群较富有的一群人，而后的成员则主要由较低及劳工阶级。

然而，华裔左派份子不完全是共产主义。事实上，国民党中还有一个微妙但确实的区别：亲西方且反共的右派及更赞同前苏联、亲近中国共产党、更反对帝国主义的左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整体而言，共产份子在华裔小区里获得劳工阶级及激进

派学生的支持，而国民党左派份子则建基于较低-中产阶级，例如小资产阶级及小型商人。

共产主义者及国民党左派经常在他们与国民党右派的战斗中合作。后者由蒋介石领导，而他在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前的 1930 年代都表现出亲西方及似乎对日本人让步的立场。

这里还必须注明：即使受到汪精卫的影响，但在中国及英殖马来亚只有非常少数华裔成为日本通敌者。汪精卫之前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孙中山的门徒，并在南京大屠杀后，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在南京设立了一个卖国政权。王精卫在英殖马来亚的支持者及间谍都被政治部视为潜在的敌方特工而遭到监视。¹

柯林亚伯拉罕具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左右派的区分也发生在马来及印裔社群当中；尤其在战后时期，反殖左翼的马来势力非常具有影响力，并被英国人视为对他们统治的最主要威胁。他们设计了一些招安及压制的计划来中和及颠覆这些威胁。

当然，马来亚共产党也发现反殖马来左派的革命潜能性，并设计了一些策略。例如陈南负责协调的马来工务局（Malay Works Department）及全马训练营（Kem Se Malaya）就为了明确地向它主要的敌人即英殖民主义展现势力。²

另外，柯林亚伯拉罕拉更进一步正确地指出：19 世纪时的马来贵族及农民领袖所进行的反殖抗争强烈地激起了马来左派。我曾经会见及访问那些现在住在泰南的马共老兵如阿都拉西迪、已故的拉昔迈丁（1917-2006年）、阿布沙马（Abu Samah）及西蒂诺姬亚（Siti Norkiah）。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孩童时期所听到有关霹雳及彭亨的反英抗争运动传说形成了他们日后的政治意识及观点。

事实上（就如鸭布尔拉罕指出），马来亚共产党在它自己的官方史中承认反英马来贵族及农民领袖扮演的进步角色，但该党也宣称后者遭到失败后，而该党作为一个现代及世界性反殖及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已经超越或取代了它们。

柯林亚伯拉罕拉这本书其中一个特色是它重新发现了马来、华裔及印裔社群的左翼在独立斗争时所扮演的重要及关键性角色。事实上，默迪卡这口号来自那个于 1945 年 9 月 17 日在怡保所创立的马来左派，即马来亚马来民族党。它从 1946 年 5 月 11 日在新山的创立典礼至第一任主席拿督翁查化辞职为止这期间，原本的巫统使用了非常种族排外性的口号，即“马来人万岁”，并指控那个使用默迪卡的人为“极端份子。”³

然而，如果及当柯林亚伯拉罕拉这本书能够加入最近阿都拉西迪及拉昔迈丁刚出版的马来文回忆录，还有阿布沙马的自传（沙马在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前是彭亨州的巫青团领袖）等这些著作所提供的新事实及观点时，那么就似乎能够更进一步加强这本书对于这方面的叙述及论述。

最后，我想强调柯林亚伯拉罕拉那个将马来亚共产党涉及的协议视为马来亚现代史主题的努力。

整体而言，我认为马共多年来（尤其在冷战时期及“紧急状态”时）遭到它的敌人诽谤及邪恶化，而柯林亚伯拉罕拉在相关得重要分析上却能保持公正及均衡。

陈平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承认马共的确犯了一些失误及错误。但，在我的观点里，那些失误及错误不能否定、更不能无效化该党从它于 1930 年代创党后为马来亚所有族群所作出的贡献。

事实上，虽然该党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南洋分部，但在 1930 年 4 月正式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却也是我们的历史中第一个鼓励所有民族参与及具有马来亚倾向的现代化政党。

许多中文文件及著作都显示了该党用了很多的努力去与他们内部的“华裔沙文主义”或毛泽东称的“大汉人沙文主义”战斗。例如在该党中央委员政治局所发出的一份日期为 1952 年 5 月 15 日的中文传单内就禁止了一般士兵在该党的文件及出版品中使用“吉林”及“藩”等具有种族主义的字眼；他们还批评那